

史 家称唐代诸帝多饵药，23 人当中有 6 人染此，或媾疾，或陨身。然明代 16 帝中，服丹者竟达 9 人之多，堪称历代之冠。今概谈于下，以补史阙。

### 服食丹药之皇帝

明代皇帝服丹，实肇于太祖朱元璋。他自称其母服道士所遗白丸大丹而孕，即诞“白气自东南贯室，异香经宿不散”，（《纪录汇编》卷一二）真乃天命所在，生也不凡。太祖起事，军中多网罗方士道流，其中有周颠仙者，深得信任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 年），太祖“患热病，几将死去”。周颠仙遣赤脚僧送药至，“太祖遂服之，初无甚异，初服在未时间，至点灯时周身肉抽掣，此药之效也，当夜病初愈，精神日强一日”，因赋诗“神怜黔首增吾寿，丹饵来临久疾瘳”称赞药效。（同上卷六）在乃父影响下，诸皇子亦多有服丹者。成祖朱棣多年征战，有风湿之疾，曾祷二徐真君而瘥，遂建灵济宫崇奉之，“每遭疾，辄遣使问神，庙祝诡为仙方以进，药性多烈，服之辄痰壅气逆，多暴怒，至失音”。侍臣进谏，他却反说：“仙药不服，服凡药耶？”（《明史》卷二九九）

仁宗朱高炽在位仅 9 个月，死因与服丹

定陵共出土革带 12 条，均未以带钩相连接。其系带方法大致分为两种：一是在革带的一端（长方形玉版）内侧缝有一鎏金铜插销座，座的上下有方孔，中间有椭圆形孔；革带的另一端（小块玉版）内侧缝制一舌形簧。系带时，将舌形簧插入插销孔中，簧就会自动弹开、卡牢。长方形玉版的另一侧也有一小块玉版，革带系好后，3 块玉版（又称“三台”）衔接紧密，正好遮掩住接连处的缝隙，非常美观。解带时用手从插销座的椭圆形孔内将簧片压下、推出，革带即可解开。另外，革带的左右内侧还各制一带扣，用以调节革带的长短。二是在革带的一端缀连 1 块长方形玉版，并于此端的里侧制一条副带，副带上有眼；革带的另一端连缀带铜钎的玉带扣和玉方案各 1 件。副带上的带眼及带铜钎的玉带扣，有些类似今天的腰带。系带时，将副带穿入另一端的带扣中，待里侧的副带系牢后，将另一端的长方形玉版插入玉方案内，遮盖住里侧的带扣，这样外观上便看不出任何痕迹。南京市博物馆编著的馆藏《明朝首饰冠服》图录中，共介绍了 22 条革带。它们尽管出土地点不同，制造时间相异，佩戴者的身份地位也有很大差别，但无一例外均未使用带钩，而且多采用第一种系带方法。

那么，在现存的明代画像中，革带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？明宪宗袞服像和仁宗常服像所绘革带，均作“三台”样式。而山东省博物馆藏的《戚继光像》、《歧阳世家文物图像》中的十一世临淮侯李邦镇画像、《中国历代服饰史》中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绍画像，以及传明邢玠夫妇画像中的革带，也为“三台”式样，与定陵出土的革带系带方法大致相同。

定陵出土的 5 件带钩，分别放置在万历皇帝棺内西端南、北两侧，其上没有任何附着物品。而出土的 12 条革带，除 1 条系在万历皇帝的身体上，其余分别置于棺内中部南北两侧和随葬器物箱内。带钩与革带，在此并未发生任何关系。可见带钩的束腰作用已经消失，进而完全演变成为一种观赏物品。

## 明代皇帝

## 多服丹药

○ 程志强

有直接关系。史称其“嗣统未及期月，奄弃群臣，揆厥所由，皆俭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症也”。（《明史》卷一三七）此后，明帝服丹之风稍息，迨至宪宗而复炽。李孜省进“朱砂养修炼之秘药”，僧继晓以秘术进，故而最得宠信。其他如邓常恩、赵玉芝等“俱以市井庸流、穿窬小辈。或假金丹为射利之策，或作淫巧为迎身之媒”。大臣万安、李实、张善辈俱献秘方仙丹以邀宠，致使“术误金丹，一时寝庙不宁，旬日宫车宴驾”。（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二）孝宗朱祐樞号称中兴贤君，亦不能免俗。宦官李广以修炼服食之说进，“召集道流，以致黄白修炼之术，丹药符录之伎杂进并兴”。后李广因得罪太后而自杀，孝宗仍令内侍搜索奇方秘书，其死亦与此有关。武宗朱厚照从番俗习房中术，不闻饵药。

世宗朱厚熜从中年开始服食丹药，时间之长，迷恋之深，实为诸帝之冠。其药常用者有：红铅，“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”；秋石，“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”；含真饼子，取初生婴儿口中血炼之。（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一八、二一）另外还有“诸品仙方”、“百花仙酒”、“天水生元”、“三元丹”等，名目繁多，不可胜计。世宗因此“晚年须眉脱落，乃至

大渐，丹毒并作”。（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二四〇）其子穆宗朱载堉“循用此等药物，致损圣体。阳物昼夜不仆，遂不能视朝”。（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一）光宗朱常洛即位仅一月即亡，死因是服用“红铅助火之物，一夕遂至大故”，（《涌幢小品》卷二五）是为明史上有名的“红丸案”。熹宗朱由校昏昧，兵部尚书霍维华进仙方灵露饮，“帝初甘之，已渐厌，及得疾，体肿”，（《明史》卷三〇六）因此而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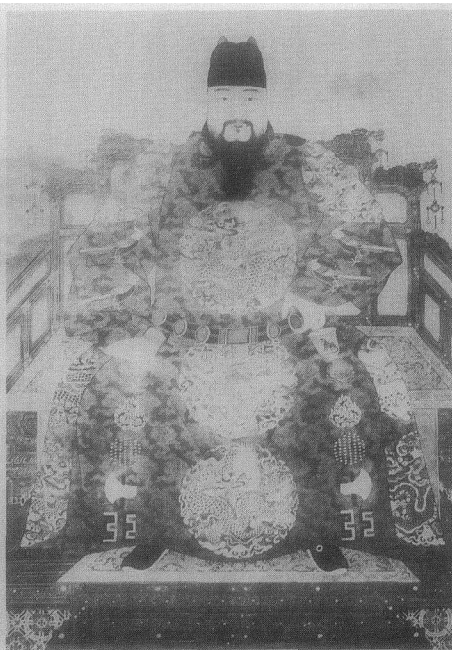
崇祯时国事日棘，思宗朱由检不迓声色，然明朝败亡已成定局，国势与风气皆难挽回。至南明弘光小朝廷，虽仅半壁河山，仍偷生梦死，迷恋丹药，时多取蛤蟆以制丹，乃有“蛤蟆天子”之谓。有明一代，可谓以服丹始，以服丹终。

### 服食丹药之因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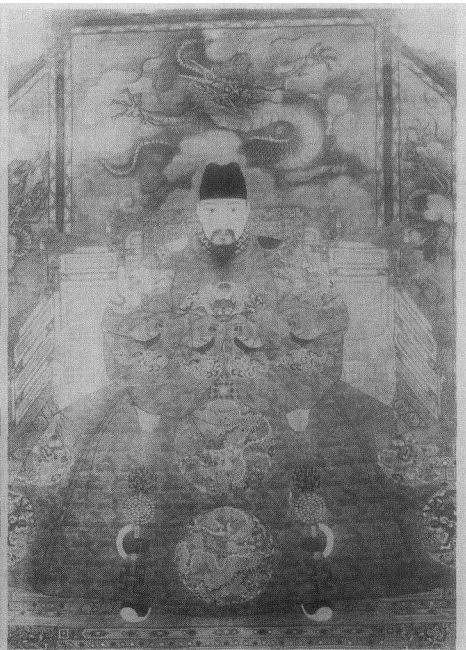
取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，明代诸帝亦不乏清醒者。如太祖曾说：“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……然卒无验……切不可信。”永乐年间，有献金丹及方书者，成祖也说：“秦皇汉武，一生妖人所烦，求长生不死之药，此又欲欺朕。朕无用金丹，令自食之，方书亦毁之。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五九、一〇七）



明仁宗



明宪宗



明孝宗

然此种言论,在诸帝中无异于空谷足音,即二祖自身也未能始终如一。诸帝迷恋丹药,死者相继而不悟,大概而论,动机无外疗疾、求长生、助淫与求嗣。

先说疗疾与求长生。古时道流多通医术,借此以饰其神异。太祖、成祖固不信长生之说,然于所谓仙丹疗疾则不疑。亦借之以示神佑,宣扬天命所在之策。后代宫生之主,体质素弱,所求于此者尤多。明代皇帝平均寿命为43岁(唐代49岁,清代53岁),十六帝中,仅太祖、成祖、世宗年过六旬,40岁以下者达9人,因此诸帝自幼即蒙上死亡的阴影。如世宗自幼多病,即位后惰于早朝,嘉靖十三年一场大病,“重咳六十日”,十九年冬“复得奇疾,非寒非热,卧三旬乃起”。(《弇山堂别集》卷一五)其遗诏“缘只多病,过求长生”之语,虽出自辅臣之手,却非完全诿过之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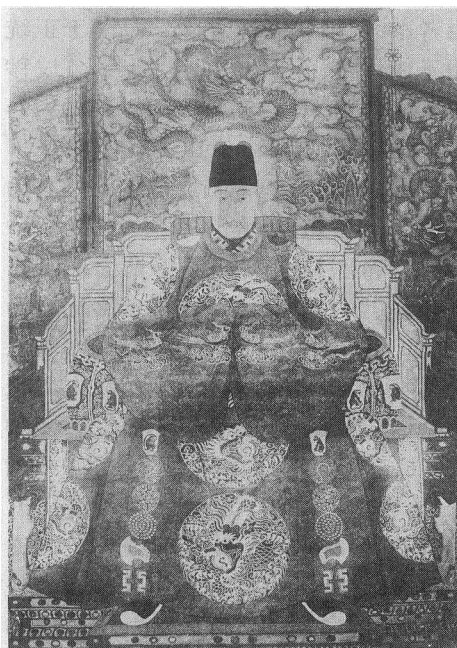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助淫与求嗣。封建皇帝既思恣欲,又望多子,遂有求于道家兴国广嗣、房中调摄之术。明代诸帝除太祖之外,子嗣普遍不旺,如惠帝、宣宗均2子,景帝仅1子,武宗31岁盛年无子而亡;所得子又多殇,如景帝仅1子而殇、孝宗5子殇2、世宗13子殇9、穆宗10子殇4、神宗18子殇11、熹

宗5子皆殇。因此诸帝服丹,助淫之外,求嗣亦是重要动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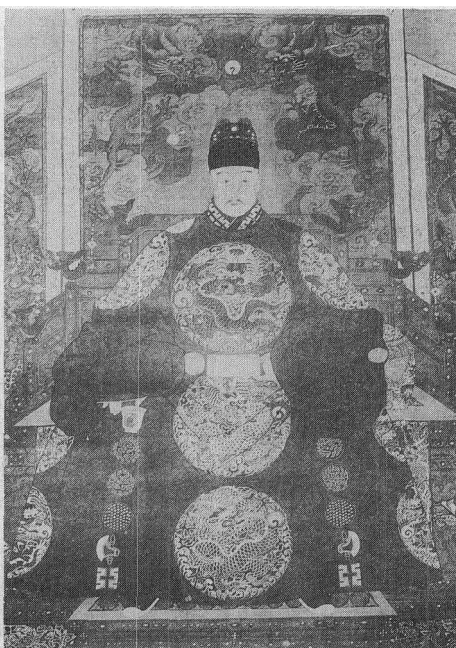
仁宗之死,据太监称是因为“阴症”。证之李时勉谏仁宗“衰经之中……中官远自建宁选取侍女”,沉湎女色,至“旭日已旦,朝仪方肃”,(《明通鉴》卷一八)可知其求金石之方以济欲,终至丧身。宪宗所服之丹多为媚药淫术,如李孜省“献淫邪方术”,万安进“秘疏一篋”,“皆论房中术者”。(《明史》卷一六八)又有所谓紫霞杯者,乃热剂,以硫磺为主,亦为宪宗所常服。世宗睹武宗之悲剧,黜佛崇道,虽异途而同归。所服红铅,据云“其性大热,峻补命门淫火。陈酒服一枚,少顷蒙昧如醉;若连服二枚,则邪火内拒,令人暴亡”。(张璐《本经逢原》卷四“人部”)秋石,“久服之,令人成渴疾,盖此物既经锻炼,其气近温。服者多是淫欲之人,藉此放肆,虚阳妄作,真水愈涸,安得不渴邪”? (《本草纲目》卷五二“人部”)百花仙酒,饮之“能使丹田即刻火发”。(《留青日札摘抄》卷四)世宗终因丹毒而亡。其后光宗复踵其辙,命丧于藉以纵欲之红铅。

### 服食丹药之影响

在封建时代,帝王的好恶不仅直接影



明世宗



明穆宗



明光宗

明熹宗



响其自身与皇室，更关系天下风俗与社稷安危。明代诸帝服食丹药，实为明史上一重大事件，影响深远。

其一，害及自身。诸帝藉药以恣欲、求嗣、疗疾、求长生，戕生伐性，无异于南辕北辙。不惟丧命者多，且其寡子、诸帝之体弱及智力低下，多色情狂与变态者恐亦与此有关。其中，以穆宗之低智、武宗之渔色和熹宗之昏昧最为典型。

其二，危及政治。诸帝因服丹而骤亡，往往影响政局稳定。如光宗在位仅1月，因“红丸”而又起“移宫”之案，连同“梃击”，史称“三案”，成为明末党争的大关节。方士乱政，更是除宦官之祸外的明代又一大秕政。宪宗宠信方术，遂用中旨传升僧道杂流，时称传奉官，“左道邪术之人荐至京师，吏部尚书尹旻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”。（《明宪宗实录》卷一五九）致使“羽流加号真人、高士者亦盈都下”。（《明通鉴》卷三一）方士李孜省以药献媚皇帝，“凡所言，无弗允者”，“八年间官至礼部左侍郎，掌通政司，恃恩恣骄，有忤之者必害之”。（《明孝宗实录》卷八）树党植援，遂开明季党争祸习。世宗服食丹药，既性情暴躁，又讳言己过，遂对直谏之臣杖杀相继，大臣之进退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虔心奉道。对于方士则恩宠无涯，如段朝用称其术可得不

死之药，世宗便专拨一地供其烧炼。而陶仲文以祈祷小方为皇帝疗疾，以库吏起家，竟至不二岁登三孤，明代仅此一人。大臣献媚，官风大坏。如阁臣夏言进献女子玉器，严嵩代尝丹药以固宠；顾可学献秋石方，盛端明、朱隆禧以所谓长生术进，皆从废籍起复，加官或至礼部尚书，时遂有“秋石尚书”之讥。

其三，祸及社会。诸帝服丹，既造成社会痛苦，又促成风气靡烂。据称，取红铅须“择十三四岁童女、美丽端正者；一切病患、残疾、声雄、发粗及实女无经者，俱不用”。（《五杂俎》卷一一）嘉靖三十一年，“帝命京师内外，选八至十四岁三百人入宫；己卯（三十四年），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。盖从陶仲文言，供炼丹药也”。（《万历野获编》补遗卷一）时人有诗曰：“两角鸦青双筋红，灵犀一点未曾通，自缘身作延年药，憔悴春风雨露中。”（王世贞《西城宫词》）此风流传民间，“术家有导取红铅者，使童女内服壮阳泄阴之药，外用异术以取之，往往致瘵，是杀人以疗人也”。（吴崐《医方考》卷三）在帝王的影响下，诸王、大臣多有奉道饵药者。如辽王宪炆听信妖术，乃至割生人首合药；大臣万安、张居正、谭纶等皆习房中术。论者谓：“国朝士风之敝，浸淫于正统而靡溃于成化，……谏诤风气之臣，争议秽媒，一时风尚可知。”（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一一）嘉靖时期，诸王、大臣、百官、平民，莫不以方术求荣，举国若狂。富家之稍有势力者，多采道教方药以助淫。

明代诸帝服食丹药，使得社会风气日下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，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闱方药之事为耻”，“风气既变，并及文林，故自方士进用以来。方药盛，妖心兴，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，且每叙床第之事也”。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·明之人情小说》）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之类的神魔小说与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之类的艳情小说，实为明代特有的现象。而道教，也在这种风气中更加方术化与世俗化，道教教团的腐朽与道教义理的衰落，成为无可挽回的趋势。